

哈菲佐娃：哈萨克斯坦汉学的拓荒者

□ 文龙杰

中亚国家的汉学研究虽起步较晚，但却不乏名家名手。哈萨克斯坦著名汉学家、哈萨克斯坦自然科学学院院士、历史学博士克拉拉·哈菲佐娃（Klara Shaysultanovna Khafizova, 1939年—）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哈菲佐娃是哈萨克斯坦汉学的奠基人和拓荒者，拥有多个“第一”：哈萨克斯坦第一位汉学博士、第一位系统研究中国问题的哈萨克斯坦女性、第一位哈萨克斯坦高校汉语教研室主任、第一位系统整理中国与中亚关系史的学者。哈菲佐娃主攻中亚国家与中国关系史，强调论从史出，注重一手中文档案文献的挖掘、编译和使用，并在研究中引入文明对话视角，促进中哈、中国与中亚各国之间的相互了解。2019年12月，哈萨克斯坦总统授予哈菲佐娃“帕拉萨特”勋章（智慧勋章），以表彰其突出的学术贡献。

哈萨克斯坦第一位汉学博士

与那些由传教士或外交官“转行”到汉学研究的汉学家相比，哈菲佐娃算是“学院派”。哈菲佐娃在苏联时期打下了坚实的汉学研究基础。她1958年考入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塔什干中亚国立大学东方学院中文系（1960年更名为塔什干国立大学），正式开始学习汉语以及英语、日语。1962—1963年，哈菲佐娃被派到北京大学学习，提升学养并结识了一些研究中国语言、社会、历史、文化的知名苏联学者。1964年大学毕业后，哈菲佐娃被分配到撒马尔罕第十中学担任汉语教师。1969年7月，哈菲佐娃进入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科学院哈萨克历史、考古和民族志研究所工作。与此同时，她还得到了一个前往世界汉学重镇之一——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攻读研究生的机会，师从苏联历史学家、东方学家鲍里斯·巴甫洛维奇·古列维奇，并每周跟随中国老师文彦学习12至14个小时的古代汉语。自此开始，哈菲佐娃进入学习与研究并重的阶段。1973年，哈菲佐娃根据中国和俄罗斯档案资料，围绕18世纪下半叶清王朝与哈萨克汗国的关系这个主题撰写论文，并于1974年通过答辩获得了副博士学位。

哈萨克斯坦独立后，哈菲佐娃于1991年受邀担任哈萨克斯坦国立大学汉语言文学系主任，成为第一位哈萨克斯坦高校汉语教研室主任。当时的师资力量和教学条件均显薄弱，选苗子、编教材、推合作，哈萨克斯坦的汉学教学研究框架在哈菲佐娃和同事们的努力下逐渐搭建起来。1995年，她被哈萨克斯坦总统任命为哈萨克斯坦总统战略研究所外交和国防政策研究室首席研究员，同年出版专著《14

至19世纪中国在中亚地区的外交》，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历史学博士学位论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成为哈萨克斯坦的第一位汉学博士，第一位系统研究中国问题的哈萨克斯坦女性。

深耕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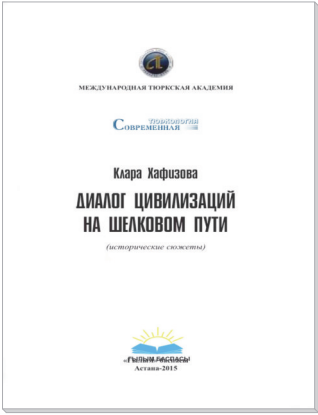
哈菲佐娃的汉学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史领域，其代表作有《清王朝和哈萨克汗国》《14至19世纪中国在中亚地区的外交》《草原统治者与其18—19世纪外交》等。

哈菲佐娃对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史研究的突出贡献，是将中亚国家与中国之间直接交流交往的历史挖掘出来，让人们可以从历史中汲取对话、交流与合作的经验。在哈菲佐娃之前，过去的研究普遍存在中亚视角缺席的问题，如哈菲佐娃所说，好像中亚国家与中国不存在直接联系一样，双方之间的一切联系似乎都是通过莫斯科或圣彼得堡建立起来的，但这不符合历史事实。

从其副博士论文，到博士论文《14至19世纪中国在中亚地区的外交》，再到专著《清王朝和哈萨克汗国》，哈菲佐娃将中亚视角贯穿始终。关于中亚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她表示“我不是第一个讨论这个话题的人”，“在我看来，我的方法的新颖之处在于尝试基于哈萨克汗国的政治、经济、战略利益进行重新审视”，正是中亚视角的补入，使其将中亚国家与中国之间直接交流交往的历史挖掘了出来。她花功夫整理哈萨克斯坦著名历史学家乔坎·瓦里汗诺夫集中与中国有关的部分，也是出于这种考量。

历史学要求“无征不信”，史料是历史学研究的基础。哈菲佐娃不仅在自己的著作中注重使用一手中文文献，尤其是原始档案，还特别看重中文文献的搜集、整理、编译和出版工作，这种严谨的治学方法，对俄语世界的汉学和中亚史学者嘉惠颇多。1994年，她与其他学者合作出版了一部关于14—19世纪中亚民族的历史文献资料汇编，许多文献是首次在俄语世界出版。1998—1999年间，她曾在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工作3个月，查阅了1644—1911年哈萨克汗国与清王朝关系史有关的文献，并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建立了学术联系。

2019年出版的俄文著作《草原统治者与其18—19世纪外交》被认为是哈菲佐娃汉学研究的集大成者和创新之作，在俄语世界引发不小反响。哈菲佐娃说，她花了50年时间完成了该书，“这本书是我半个世纪研究哈中关系史的成果”。在关于该书的座谈会上，她介绍了自己的研究方法：先翻译原始档案资料并公开出版，然后



哈菲佐娃著《丝绸之路上的文明对话》

根据这些资料撰写专著，这既“有利于其他研究者根据原始资料对我的研究进行评判”，也为其他研究者开展研究提供了材料上的方便。

以文明对话研究视角促进中哈了解

在哈菲佐娃的研究中，历史与现实并不割裂。她曾长时期担任哈萨克斯坦总统战略研究所外交和国防政策研究室首席研究员、主任，在外交和国内政策、社会经济发展等战略问题上，为该国领导人提供咨政参考。无论是在高校从事教学，还是在智库担任高参“智囊”，哈菲佐娃都致力于用从历史中发现的事实、经验和智慧，来推动哈萨克斯坦与中国的相互了解和友好交往。发现和推动文明对话，一直是哈菲佐娃研究和撰写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史的主基调。

随着学术积累的日渐深厚，她转向以综合的文明对话视角来总括中国与中亚国家交流交往的“过去与现在”。文明对话成为哈菲佐娃汉学研究新阶段的关键词，她于2013年出版了专著《中亚和东亚的文明对话》，又在该书基础上加以丰富于2015年出版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对话》。在文明对话视角的统摄下，哈菲佐娃推出了自己研究成果的集大成之作《草原统治者和其18—19世纪外交》。在该著作的研讨会上，哈菲佐娃说道：“以前我从经济和政治角度来看待问题，那是相当狭隘的，后来我开始从文明的角度来开展研究。”哈菲佐娃在上述著作中，通过客观而细腻的历史梳理，描绘出中国文化和游牧文化的对话、碰撞和交融，以及“天朝”在草原民族认知中的正面和积极形象。哈菲佐娃认为，“中国文化和游牧文化的对话、碰撞和交融是古丝绸之路（精神）的主要体现”，“文化沟通可以增加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和信任，使我们的世界更宽容”。

通过汉学研究促进中哈相互了

解，已成为哈菲佐娃工作和生活的重要部分。例如，她曾在哈萨克斯坦电视台《大草原与中国》节目中，以阿布来汗与清朝皇帝的书信往来为引子，讲述中哈友好交流交往史。哈菲佐娃始终对汉学研究抱有浓厚兴趣，她认为“对中国的兴趣以及对中文的掌握，能够帮助我理解分析历史事实，并由此展开对中国政治文化和中华文明特性更深层次的研究”。她经常叮嘱学生，不知道历史上的中国，就不了解现在的中国，“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一定要多研究，培养兴趣”。

哈菲佐娃还从文明对话角度认识“一带一路”倡议。她认为，“一带一路”是一个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基础上提出的全球性项目，对几乎各大洲国家产生了经济、人道主义和文化影响。通过回顾“一带一路”历史就可以发现，它不仅是中国加强与周边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联系的工具，也是开展文明对话的新途径。“复兴丝绸之路对于中国和包括哈萨克斯坦在内的拥有相同历史的邻国都具有重要意义”，“我认为这个项目对于继续文明对话的作用怎么估计都不为过”。哈菲佐娃在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表示，不同文明之间的认知过程有其规律和方法。对其他文明的拒斥，本质上还是对这种文明的无知。要改变这种现象，既要认识到不同文明间现在和未来的相互依存关系，也要积累知识以克服成见，还要不断精进在道德及精神上的自我修养。

哈菲佐娃作为哈萨克斯坦汉学的拓荒者和奠基者，为推动中哈两国交往和互相了解作出了重要贡献，她认为自己的汉学研究成果可以看成是不同文明之间对话的结果。她的汉学研究立论严谨、视野开阔，于苏联汉学传统的基础上开辟出哈萨克斯坦汉学的独特视角和理路。哈萨克斯坦战略研究所所长埃尔金·图库莫夫评价说，哈菲佐娃是“一位在最复杂的领域之一——中国研究领域坚持不懈进行科学研究的典范”，激励了新一代年轻研究人员为独立的哈萨克斯坦东方学和中国研究的发展作出贡献。

如今哈菲佐娃尽管已经年过八旬，但仍致力于通过汉学研究推动中亚国家对中国的了解。忆及自己的汉学研究生涯，哈菲佐娃说，与中国的缘分是命中注定，“我的生活中最有意思的、最美好的都和 中国有关，中国在我的生活里像是节日一样”。



（上接1版头条）从第一次产业革命实现国民经济的“机械化”，到第二次产业革命推动的“电气化”，再到第三次产业革命实现的“信息化”，直到现阶段正在深入展开的“数字化”，都是这一进程的历史时代特征的集中体现。

新质生产力水平决定经济发展的实质，关键在结构。新质生产力是建立在生产要素质的改变及相应的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基础之上，是以创新为根本特征的产业结构高度演进为经济体现、以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结构构成产业变革和国民经济结构质态提升的微观基础，其发展水平从根本上规定着经济发展“质的提升”。无论是在经济发展史上还是当代经济竞争中，这种“质的提升”都具有决定性意义。一方面，从我国历史上看，19世纪初中国的GDP总量居世界首位，按现在的核算方法估计约占当时全球GDP 30%以上。但之所以迅速败于西方文明，从经济上来看重要的在于质上的差距，即结构上的落后。另一方面，从当代的竞争来看，在GDP数量上我们在不断缩小与美国的差距，从改革开放初期相当于美国的6.3%，提高至现在的70%左右。需要认识到，更重要的不是量上的追赶，而是质上的提升。从我国现代化新征程第一阶段所要求的发展目标上看（2035年人均GDP水平赶上中等发达国家），要求2021—2035年我国GDP按不变价翻一番，年均增长率要达到4.8%；从实现发展目标所面临的约束条件上看，特别是“双碳”目标的要求和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影响，不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依照现有生产方式，其自然增长率难以满足目标函数和约束函数的要求。只有依靠新质生产力的先进性，才能切实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这一中心任务。

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要遵循科技创新规律和经济发展规律

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认识和把握科技创新特性。一方面要深入探索科技创新人才培养规律，跨越人才培养的鸿沟。科技创新需要战略科学家、杰出工程师、领军企业家，我们不仅需要培养这些人才，还需要将其有效集成。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坚持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一体推进；坚持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开放创新一体设计；坚持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一体部署。另一方面要认真研究科技创新投资特点，对冲科技创新投资的“归零效应”。科技创

新投资较之一般物质生产投资重要在于具有“黑洞”效应，即创新的不确定性导致很难事先确认投资规模，同时也不能在初始投资形成生产能力后不再追加，在寿命期内依靠折旧逐渐回收，而是需要持续跟进投资，否则在竞争中落伍，其他竞争者率先突破并使之产业化，落伍者以往的投资即“归零”。这就需要在指导思想和体制上尽力适应创新投资的“黑洞”特性，避免“归零效应”；健全相应的风险分散和化解机制，提升国民经济支付科技创新成本的能力。

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探索和遵循经济发展规律。一是尊重经济结构演进和变革规律。一方面，经济结构演进和产业结构变革有其内在历史逻辑，人为地超越或破坏这种客观历史逻辑即为“虚高度”，即脱离全要素生产率和产业竞争力提供的可能及要求的推升产业高度，本质上“虚高度”就是经济泡沫，不仅难以真正实现当下的有效发展，而且给未来长远发展留下严重隐患、增大发展成本；另一方面，在现阶段产业革命和科技革命深入展开的变革时期，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具有多方面“后发优势”，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既可以借鉴发达经济体历史上“串联式”发展的经验教训，更具有后发经济体的“并联式”可能，要勇于积极探索、大胆创新，敢于并善于开辟新赛道，避免因循守旧、亦步亦趋，切实形成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三方面的有机统一。二是尊重经济空间布局特点和规律。一方面，新质生产力的空间载体需要合理布局，体现区域资源禀赋特点，进而实现空间结构性效率，力戒区域“结构性趋同”，必须因地制宜；另一方面，需要培育“发展极”，形成创新发展的带动中心，发挥其极化效应。三是尊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宏观上，需要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对立统一矛盾运动规律。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发展更具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意义，需要坚持以其为主线，以在市场竞争中形成的有效需求来约束供给，以高质量的供给来创造需求，现阶段尤其需要统筹协调扩大内需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微观上，需要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垄断与竞争的博弈规律，以创新驱动为特征、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的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充分竞争。需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市场与企业、政府与企业、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等方面在市场竞争中的相互关系，在制度上加快构建高水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

（上接1版二条）

聚焦“六个如何始终”着力解决大党独有难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提出的“六个如何始终”内涵丰富、逻辑严密，指出的都是党在新征程上最为紧迫、最为要害、最为根本的大问题。解决大党独有难题，要准确把握“六个如何始终”的深刻内涵，在这个主攻方向上精准发力、持续用力，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形成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现问题、纠正偏差的机制，不断巩固发展中国共产党之治的独特优势。

着力解决“如何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难题。一个政党的初心使命，诠释着这个党“是什么、干什么”“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是根本性、方向性的大问题。我们党自成立以来，所付出的一切努力、进行的一切斗争、作出的一切牺牲，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忘记了初心使命，我们党的干部就会腐化、堕落，我们的党就会变质、变色、变味，就会失去人民、失去未来。新时代新征程，目标更加宏伟、任务愈加繁重、挑战日益

严峻，需要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坚定维护党章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坚决防范一切违背初心使命、动摇党的根基的危险，督促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叩问初心、守护初心，不断坚守使命、担当使命，始终做到初心如磐、使命在肩。

着力解决“如何始终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的难题。我们党是高度集中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上的统一、政治上的团结、行动上的一致是党的事业不断发展壮大的根本所在。治理我们这样一个大党大国，如果没有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如果没有全党全国思想统一、步调一致，就什么事也办不成。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及时发现、着力解决“七个有之”问题，消除危害党的团结统一的政治隐患。完善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制，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开展政治监督，确保全党步调一致向前进。

着力解决“如何始终具备强大的

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难题。我们党是一个在14亿多人口大国长期执政的党，能力不足、本领不强，就无法团结带领人民完成新时代新征程的使命任务，提高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是我们党勇担时代重任的现实要求。要加强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增强党员干部推动高质量发展本领、服务群众本领、防范化解风险本领，提高防风险、迎挑战、抗打压能力。推进作风建设的常态化长效化，促进党员干部在思想上、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生活作风上全面过硬，以作风进步带动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提升。

着力解决“如何始终保持干事创业精神状态”的难题。我们党百余年奋斗的伟大成就都是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拼出来、干出来的，要把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仍然要靠拼、要靠干。大党长期执政，承平日久，容易追求安逸享乐，从而精神懈怠、意志消沉、不思进取。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牢记“三个务必”、践行“三严三实”，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积极进取的精神品格，在迎接挑战和攻坚克难中奋勇向前。把从严管理监督和鼓励担

当作为高度统一起来，捆住一些人乱作为的手脚，放广大党员干部担当作为的手脚，充分调动保护党员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

着力解决“如何始终能够及时发现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的难题。我们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不讳疾忌医、不文过饰非，敢于检视自身、常思己过，及时发现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在长期执政条件下，我们要防止忽略自身不足、忽视自身问题的现象，避免陷入“革别人命容易、革自己命难”的境地。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不断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不断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全面推进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构建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不断完善及时发现问题的防范机制、精准纠正偏差的矫正机制、强化责任担当的问责机制，依靠党自身力量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现问题、纠正偏差。

着力解决“如何始终保持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的难题。政治生态是党风、政风、社会风气的综合体现。政治生态好，干部队伍就会风清气正、心齐气顺，社会风气就会积极向

上、充满正能量。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涵养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弘扬和践行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等价值观，倡导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规规矩矩的上下级关系、亲清统一的新型政商关系。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决铲除腐败这个破坏政治生态的致命污染源，引导党员干部真正因敬畏而“不敢”、因制度而“不能”、因觉悟而“不想”，持续构建正气充盈的政治环境。

以坚定态度和科学方法推动解决大党独有难题走深走实

解决大党独有难题，既要有坚定态度也要有科学方法，必须坚持问题导向，保持战略定力，标本兼治、综合施策、协同发力、锲而不舍、久久为功，积小胜为大胜。

坚持严的基调。从严管党治党，是我们党的鲜明底色和独特优势，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的重要经验。解决大党独有难题，必须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突出严的重点，创新严的举措，保持严的

常态，把严的要求贯穿始终。

坚持问题导向。大党独有难题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要始终保持正视问题的自觉，一个问题一个问题推进解决。既注重解决面上问题，又注重解决深层次问题；既注重解决反复发生的老问题，又注重解决新出现的问题，做到管党有力、治党有力、建党有效。

坚持系统观念。解决大党独有难题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更加突出党的各方面建设之间有机衔接、联动集成、协同协调，更加突出体制机制的健全完善和法规制度的科学有效，更加突出运用治理的理念、系统的观念、辩证的思维管党治党建设党，不断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更加科学、更加严密、更加有效的思路举措解决大党独有难题。

坚持久久为功。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必然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保持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坚决摒弃权宜之计、一时之举的思想，坚决克服松劲歇脚、疲劳厌战的情绪，坚决防止转变风向、降调变调的错误期待，把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底。

（作者系天津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代理主任）